

陶行知紀念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K825·4/7

陶行知纪念文集

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

诞生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达扬

封面设计：曹辉禄

南行知纪念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191千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册

书号：11118·104

定价：0.84元

目 录

| | | |
|------------------------|-------------|----|
| 序 | 胡晓风 | 1 |
| 陶行知先生传略 | | 3 |
| 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诞辰大会开会词 | 邓颖超 | 9 |
|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 胡愈之 | 11 |
| 学习陶行知为人民服务献身革命的精神 | | |
| ——在四川省纪念陶行知诞生 | | |
| 九十年大会上的讲话 | 任白戈 | 19 |
| 学习陶行知损己利人的高尚精神 | 张劲夫 | 28 |
| 纪念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 | 陈鹤琴 | 31 |
|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 | |
| ——为纪念先生诞生九十周年而作 | 张 健 | 37 |
| 陶行知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 高士其 | 47 |
| 学习陶行知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 | 金成林 | 55 |
| 高大的身影 | | |
| ——纪念陶行知先生 | 高 纶 | 58 |
| 大哉陶子 | | |
| ——深切怀念陶行知先生 | 张达扬 | 77 |
| 一个英勇的民主战士 | 吴树琴 夏志成 徐曼华 | 90 |
| 回忆陶行知先生三件事 | 戴伯韬 | 93 |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

| | | |
|-----------------------|--------------------|-----|
| ——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 | 魏东明 | 97 |
| 回忆父亲陶行知 | 陶晓光 | 104 |
| 遗爱在人间 | | |
| ——追思陶行知先生 | 周毅 | 109 |
| 要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 | 胡小明 | 116 |
| 认真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 | 晓肇 | 123 |
|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 黄明 | 129 |
| 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我见 | 陈飘 | 140 |
| 学习陶行知注重实际的精神积极开展教育实验 | 苏甫 | 150 |
|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 | 毛礼锐 | 158 |
| 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几点认识 | 孙传华 | 172 |
| “教学做合一”并非“从做中学”的变种 | | |
| ——为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 李文奎 | 182 |
| 陶行知不同于杜威 | 黄贵祥 | 193 |
| 从陶行知诗歌看他的教育思想 | 俞润生 | 201 |
|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传播和影响 | 丁冠英 | 208 |
|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解放区教育 | | |
| ——生活教育史资料 | 王琳整理 | 214 |
| 才情洋溢的大众诗人 | | |
| 读《行知诗歌集》札记 | 玛金 | 230 |
| 蒋管区的一所新型学校——育才学校 | | |
| | 四川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 | 239 |
| 社会大学的实践 | 四川省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校史研究学会 | 255 |

序

今年是陶行知逝世三十五周年和诞生九十周年。四川省纪念陶行知诞生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委托四川省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校史研究会和四川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辑了这本《陶行知纪念文集》。

纪念陶行知，要象徐特立同志那样：师陶。学习陶行知，要象邓颖超同志所讲的那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纪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还要实事求是地认识陶行知，清除过去对他的种种误解。

陶行知不同于杜威。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曾经介绍过杜威的教育学说；在陶行知的影响下，杜威也支持过中国的民主救国斗争，如联合世界著名学者致电国民党政府，援救中国救国会的“七君子”；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是好的，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在从事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他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变“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超越了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育思想范畴，成为杜威教育思想的叛逆。陶行知与杜威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把陶行知与杜威等同起来。

陶行知不同于武训。陶行知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曾经用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借以自喻，陶行知取其苦行兴学之所长，笃行不倦，而对其屈从于旧势力的一面，则加以扬弃。因此决不能把陶行知与武训等同

起来。

陶行知主张教育救国。陶行知为救国而办教育，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去办教育；他主张教育救国，并在救国的事业中去改革教育。这与当时主张教育是救国的唯一途径，用办教育来转移政治斗争视线的教育救国论者是根本不同的。正如邓颖超同志所说的：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

陶行知是一个人民教育家而不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他和同时代的革命者一样，曾经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他毕生为人民办教育，为人民求解放而办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自己的教育活动和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使之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陶行知就是陶行知。正如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所评价的那样，陶行知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以陶为师，普及教育，振兴中华！

胡晓风

一二·九运动四十六周年纪念于成都

陶行知先生传略

(1891—1946)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大众诗人。

陶行知先生原名文浚，后改为知行，行知。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一九〇八年毕业于歙县崇一学堂。同年秋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愿信教受洗，又因学费困难，愤而离校。一九〇九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一九一四年毕业。同年秋季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一九一五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研究教育学，获得都市学硕士和教育文监学位。

一九一七年秋季，陶行知先生由美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对教育颇多革新，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一九二一年参与筹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主任干事。致力于改革学制，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一时期，他积极倡导平民教育，编印《平民千字课》，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亲赴河北、河南等省县推行平民教育运动。

一九二六年，陶行知先生积极提倡乡村教育，为改造农村服务。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小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为改造我国农村培养人才。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晓庄师范。

晓庄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它适应我国农村特点，实施教育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教育。这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是一大创举，是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有力冲击。在晓庄，陶行知先生系统地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初步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先生把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超越了杜威狭隘经验主义的教育思想范畴，创立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体系。他既反对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又反对殖民主义的洋化教育，从而，为中国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晓庄，陶行知先生和师生一起参加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曾咏有“一闻牛粪诗百篇”之句。陶行知先生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之一。

晓庄师范的办学经验震动全国。一九二八年，浙江大学区邀请陶行知先生去杭州筹备乡村师范学校，即：后由晓庄校友主持的湘湖乡村师范。一九二九年，晓庄校友在江苏淮安创办新安小学，一九三三年秋，建立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在陶行知先生关怀、指导下，进行旅行修学，卖书、卖报、卖讲，足迹遍及十六个省市，在各界人民中宣传抗日救亡，成为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宣传队伍中的一支劲旅。陶行知先生十分关怀、重视少年儿童，“新安旅行团”标志着少年儿童作为国家小主人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陶行知先生曾热情赞扬他们是“民族的小号手”。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撤退到解放区，成为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宣传队伍。

一九三〇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许多革命青年遭到逮捕、杀害。陶行知先生被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阴

谋不轨”的罪名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先生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开办自然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张科学需要从小教起。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海圣约翰大学鉴于陶行知先生对普及和改革教育方面的卓越成就，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一九三二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的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陶行知先生为工学团规定的建团思想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按照工学团的建团思想，在大场地区农村结合农副业生产，建立了木工、藤工、棉花等许多工学团组织，进行普及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在上海市区有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工学团的活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工学团运动中，陶行知先生发现“即知即传人”的普及教育方法，创立了“小先生制”，被推广到国内二十一个省和四个特别市，并在东南亚一带推行。对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先生参加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卖国投降，成为救国运动的领袖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陶行知先生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把教育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陶行知先生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四人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共同声明，毛泽东主席于同年八月十日复信表示赞同。

同年七月，陶行知先生应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邀请，去英国伦

敦参加第七届年会，并接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到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争取海外侨胞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八月，在世界新教育会议年会上作了《推行小先生制、普及教育》的报告，九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陶行知先生以中国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月中，在瑞士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九月下旬，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后到美洲各国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美国，陶行知先生创办中华经济研究所，对日本由美国输入军火器材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查，日本的军火器材有百分之五十四、五，由美国输入，从而向美国人民提出“不参加侵略”的口号。调查报告被列入美国国会公报，成为对日禁运的主要根据之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联络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和杜威等世界名流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号召世界各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一九三八年二月，在英国伦敦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七月，在法国参加抗日救国大游行。陶行知先生在海外二年多，周游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为动员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三六年十月，陶行知先讲在伦敦拜谒了马克思墓，并吟诗赞颂这位历史巨人：“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伦敦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时，再次凭吊了马克思墓。

一九三七年四月，苏州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七君子”连同陶行知先生“以危害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提起公诉，陶行知先生虽远在国外，仍遭到国民党政府第二次通缉。

一九三八年八月，陶行知先生由美国到达香港，宣布他的回

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创办难童学校，收容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儿童；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通过教育方式发动侨胞抗日救国。十月，陶行知先生回到武汉，后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十一月，香港中华业余学校在陶行知先生指导下成立，十二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行知先生被推选为理事长。

一九三九年七月，培养人才幼苗的新型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诞生了。学校设社会、自然、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七个组，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教师。育才学校曾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成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蜚声中外。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知先生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负责主持《民主》星期刊。

一九四六年一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为民主革命运动培养人才。在此以前，陶行知先生曾举办民主讲座，第一讲由周恩来同志主讲。

同年四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达上海，继续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继国民党政府残酷杀害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之后，陶行知先生在黑名单中被名列第三，并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但他不畏强暴，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逝世前三个多月内，曾在上海许多学校和各种场合作了一百多次演讲。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处在白色恐怖下的陶行知先生，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患脑溢血逝世。在弥留之际，周恩来同志亲往探视，并在发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

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林柏渠同志的悼词说：“行知先生是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家，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并号召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者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十月二十七日，上海各人民团体举行追悼大会，并于十二月一日将陶行知先生的灵柩护送至南京劳山脚下的晓庄，由中国五十三个人民团体举行公葬。董必武同志参加公葬仪式，并宣读悼诗，称赞陶先生是“当今一圣人”。在国外，新加坡、纽约等地都曾举行追悼会，悼念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了改革中国教育，为了救国救民，艰苦探索，勇于创造，努力实践，百折不挠，表现了极为可贵的革命精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后期的教育实践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教育思想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他在教育方面的许多重要论著，是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遗产。陶行知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陶行知先生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和共产党人亲密无间，团结合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他扎根在劳动人民中间，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声气相通，他的诗发自劳动人民的心声，因而被称为大众诗人。他治学严谨，重视创造，作风民主，艰苦朴素，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陶行知先生为人民教育事业和民主革命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纪念陶行知先生九十诞辰大会开会词

邓颖超

今天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大家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他，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二十年代前后，他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内，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谋求通过教育途径救国。“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眼见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极为愤慨；同时又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非常拥护，并开始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英勇斗争，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与此同时，陶行知先生就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抗日战争之前，他从事国难教育运动，配合抗日战

争，提出开展抗战教育运动，抗战胜利后，配合民主斗争，提出开展民主教育运动，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他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猝然病逝。时年仅五十五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悼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他“十年来，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 愈 之

今年是陶行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

他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大众诗人，革命战士，进步的思想家，而更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里所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早年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研究教育。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评论”。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热心于科学、民主，首先重视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还办了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民众学校三所，以及中心茶园等事业。他脱掉西装革履，和师生一起生活、劳动，同甘共苦，和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早年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九二七年末曾写下了著名的《锄头舞歌》：“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晓庄学校开始除无党无派的师生外，还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和国民党党员。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参加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地下工作，同国家主义

派、国民党作斗争。对这个问题，陶行知同志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办学方针，说晓庄是“自由园地”，允许各党各派存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允许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并存，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主张。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晓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斗争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的游行示威。陶行知同志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保护革命青年。蒋介石下令于十二日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同志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同志回到上海。他鉴于日本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发达关系很大。得到《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帮助，创办了“自然学园”。他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随后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函授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同时，着手发动普及教育运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主要招收农民子弟，实行边工边读，并在农村儿童和群众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员协助陶行知工作，并先后派人到工学团开展工作。陶行知同志依靠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合作共事。以后又组织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市区组织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并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在工人、劳苦群众和贫苦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群众的重要，写下了《新锄头舞歌》：“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为工农群众的方向。一九三四年，他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同志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目睹蒋介石对外屈